

#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 考古学文化研究

杨 勇 著



科学出版社

#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 考古学文化研究

杨 勇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云贵高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土著族群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同时随着该地区被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汉文化大量进入并推动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本书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就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和汉文化遗存分别展开研究，初步构建了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揭示了早期汉文化的面貌。在此基础上，又围绕汉、夷文化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变迁。此外，对研究中涉及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也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本书是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的一部综合性研究专著。

本书适合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 / 杨勇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03-032102-2

I. ①战… II. ①杨… III. ①云贵高原 - 考古学文化 - 研究 - 战国时代②云贵高原 - 考古学文化 - 研究 - 秦汉时代  
IV. ①K878. 7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8127 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柴丽丽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6 3/4

印数: 1—1 300 字数: 603 000

定价: 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A Study 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Han Dynasties**

( With An English Abstract )

*By*  
Yang Yong

Science Press  
Beijing

## 序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其史学名著《史记》中写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早关于今四川西部和云南、贵州一带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各部族及其社会生活状况最为系统而又非常简明的记述。关于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各部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及其变迁，20世纪50年代晋宁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尤其是6号墓“滇王之印”金印出土以来，以石寨山文化为代表的古滇国及其文化得到确认和初步的揭示。然而，川西和云贵地区尽管已经有诸多考古发现，但西南夷其他诸部族及其文化仍然处在考古学探索之中，有些问题甚至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所谓“最大”的夜郎之争就是一例。

2004年夏，贵州省六盘水市召开了一次“夜郎文化论坛”，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文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论坛。论坛期间，与会学者就夜郎文化进行了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的讨论，而贵州、云南和湖南三地的学者，还就古夜郎所在地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在受主办方委托作论坛总结时讲到：夜郎古国和西南夷诸古部族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战国秦汉时期历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夜郎古国具体究竟在何处？其社会历史和文化面貌究竟如何？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个学术谜团的破解，有待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更系统、更深入的考古学研究。西南夷其他古部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同样如此。

很显然，就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无论对于深化这一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还是对于推进西南夷诸古部族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并且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一个迫切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2008年杨勇同志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之后，考虑到他在四川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西南地区的考古并有所积累，于是商定以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考古作为其研究方向，并拟定以《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

关于论文的写作，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目标和要求。一是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这一课题的实质，坚持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即通过比较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初步揭示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构成及其面貌，并从考古学上探讨当时的社会文化变迁。二是注重研究史的回顾和思考，认真总结以往的研究及其经验和得失，充分尊重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便在已有研究及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有所创新。三是最大限度地收集相关的考古资料，并尽可能对其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认真的

消化。因为，“论从史出”是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优良治学传统，只有详尽地占有资料才有可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才能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四是着眼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搭建和研究体系的构建，充分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等，对复杂多样的考古遗存进行时间、空间、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这既是对云贵高原地区进行总体研究的需要，更有助于在整个云贵高原的视野下对各地的各种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观察和思考。五是强化问题意识，紧紧围绕着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等基本问题，用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力争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六是认真继承和发扬考古学界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从总体上看，杨勇同志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上述六个方面的目标和要求基本达到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框架初步搭建了起来，关于各地考古学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汉文化向云贵高原的扩展、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土著文化与邻近地区古文化的联系、汉文化的“地域化”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并且就历史时期边远地区考古学研究的某些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可以说是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地区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当然，这一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其成果也是阶段性的。实际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乃至整个历史时期边远地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既面临诸多的实践问题，也面临诸多的理论问题。

历史时期的边远地区，作为中国历史疆域的一部分，其社会历史和文化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时期边远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无疑是中国考古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战国秦汉时期来说，战国时期既是诸侯争霸、列国纷争的时期，也是民族和文化大融合的一个时期，更是中国古代社会由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的转折时期；随着秦统一六国和秦王朝的建立，东周列国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构成了秦帝国的政治版图；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经略，从岭南到朝鲜半岛北部、从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地区到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区，都先后进入到汉帝国的政治版图之中，汉王朝的郡县统治和汉文化向边远地区迅速扩展，边远地区的社会历史出现了跨越性发展，其传统文化迅速汇入到中华文化的洪流之中，各古国和部族也先后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很显然，离开了边远地区的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不完整的。然而，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边远地区的记载十分有限，于是，边远地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和阐释，就更多地成为考古学的使命。因此，进一步加强边远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既是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实现考古学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重要一环。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边远地区的考古给予更高的重视，并进行更多的研究实践。

从事历史时期边远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需要具有科学的思路和视野。基于对历史时期边远地区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理解和认识，我在2008年12月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提出：历史时期边远地区考古的思路和视野，应当是“一个立足点、两个着眼点”。具体说来，一个立足点，就是立足于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研究当地社会

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演变。一个着眼点，是着眼于地处中原王朝边远地区的地理区位特点，来研究当地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认识当地的“中原化进程”以及当地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另一个着眼点，就是着眼于地处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前沿地带的地理区位特点，来研究当地在中原王朝对外交往中的“桥梁”作用，认识当地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同样如此。西南夷地区地当自然地理上的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其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4000米，丘陵、山地起伏，地形复杂，形成诸多相对封闭的大大小的地理单元。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西南夷地区在先秦时期形成了诸多既有联系、更有自身特点的部族及其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版图上尚属于中原之外的“蛮夷”之地；秦统一时期，仍然是秦帝国的西南徼外；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大规模拓疆活动并设置郡县，成为汉帝国的西南边陲，其社会历史和文化都发生了跨越式发展。上述西南夷地区战国至西汉前期各部族的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汉武帝时期的郡县设置及其以后的郡县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就是西南夷地区考古的立足点。西南夷地区在先秦和秦统一时期同巴蜀地区的联系、经由巴蜀同中原地区的联系，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对西南夷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当地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及其“汉化”进程、土著文化同汉文化的互动，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域文化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汉文化的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等，是西南夷地区考古的着眼点之一。地处汉帝国之西南边陲的地理区位特点，决定了西南夷地区在汉王朝与南亚及东南亚各地的交往中充当着“桥梁”和“通道”的角色，因此，战国至西汉前期云贵高原等地同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文化上的交流和联系、汉武帝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在中外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是西南夷地区考古的另一个着眼点。实际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以汉武帝开西南夷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前郡县时期”和“汉郡县时期”前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在考古学研究上其特点仍然有所不同，前者更强调当地土著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同邻近地区的交流和联系，而后者更强调当地的“汉化”进程、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以及同域外的联系。

就历史时期边远地区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而言，既不完全等同于史前考古，也不完全等同于历史时期考古，而是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夏鼐先生等在论及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时曾讲到在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之间存在一个“原史考古学”。何谓原史考古学？其特点和方法如何？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一般说来，原史时代是指社会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但尚无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西南夷地区的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汉置郡县之前）大致属于原史考古学的范畴。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战国秦汉时期已经进入到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西南夷地区已经有所记载，但是，这些文献记载又十分有限，尚无法完整而清晰地描绘出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图景。正因为如此，战国秦汉时期尤其是“前郡县时期”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既要重视并充分运用有限的文献记载，但更为根本的是采用史前考古的方法，即通过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的研究和解读去重建当地的社会历史。

由于历史时期边远地区部族众多并且大多见诸文献记载，于是考古遗存之族属的研究和辨识便成为边远地区考古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之“考古学文化”和“族文化”就联系在了一起。关于“文化”一词，据说目前学术界有300多种解释，而“考古学文化”和“族文化”则是考古学研究中常见的两种概念。“考古学文化”作为考古研究中的专门术语，用以表示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特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而“族文化”则是指某一部族（或某一族群、某一古国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学术界往往见仁见智，这里也无意进行系统的说明，但就历史时期边远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来说，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或即族文化的辨识属于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应当继续给予关注。其二，一种考古学文化之中可能包含不同的族文化，而一种族文化也可能被区分为多种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言：“一个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族属往往不止一个；而一个族属，也可能创造出一个以上的文化（至少是类型）”，因此，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不宜简单地等而视之。其三，族文化实际上包括不同的层次，如某一部族的文化、某一族群的文化、某一古国的文化等，并且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以西南夷地区为例：“滇文化”一般是指滇部族的文化、滇王国的文化，也可以是指以滇为中心的族群文化；“夜郎文化”是指夜郎古国的文化或者夜郎部族的文化，也可以是指以古夜郎为代表的、包括“夜郎旁小邑”在内的诸部族的族群文化；“靡莫文化”则是一种包括滇文化等诸多部族文化在内的族群文化。其四，关于族文化的辨识，物质文化具有基础性意义，但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更具有“标识性”的意义。因为，从建筑风格、丧葬习俗到人体装饰、服饰、器具上的纹样和装饰等，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无不包含着人们的族群意识，而这些精神文化的阐释在考古学研究中是可以实现的，至少是可以部分实现的，今后在族文化辨识的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更多地给予关注。

就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乃至整个历史时期边远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而言，都离不开上述理论问题，更需要科学的研究实践，尤其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杨勇同志的《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既对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又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于推进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地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应当指出的是，在该课题的研究上杨勇同志下了很大工夫，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目前的研究及其认识毕竟受到了考古发现不足的直接制约，特别是各地考古发现的严重不平衡直接影响到总体的观察和分析；有些推论性的结论有待于更多考古发现的证实或修正，尤其是关于许多考古遗存的年代判定更有待于今后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检验。凡此种种，既是考古学之学科特点的一种反映，也是需要今后密切关注并认真加以解决的。但无论如何，杨勇同志根据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先生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进行修改和完善并正式出版，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

---

实际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乃至整个历史时期边远地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任务和长期的课题。对杨勇同志来说，本书的出版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但仅仅是其学术生涯的第一步，更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杨勇同志以此为新的起点，坚持下去，继续努力，在考古学研究的道路上奋力攀登，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白云翔

2011年仲夏于北京颐慧佳园

# 目 录

序 .....	白云翔 (i)
<b>第一章 绪论</b> .....	(1)
第一节 课题的设定 .....	(1)
第二节 研究史的回顾 .....	(2)
一、主要考古发现 .....	(2)
二、主要研究 .....	(3)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构想 .....	(21)
一、内容和目标 .....	(21)
二、方法及思路 .....	(22)
三、有关问题的说明 .....	(27)
<b>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贵州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b> .....	(30)
第一节 黔西北地区土著青铜文化 .....	(31)
一、赫章辅处墓地 .....	(31)
二、赫章可乐墓地 .....	(32)
第二节 黔西南地区土著青铜文化 .....	(49)
一、普安铜鼓山遗址 .....	(49)
二、黔西南地区其他土著青铜文化遗存 .....	(54)
<b>第三章 战国秦汉时期昭鲁盆地的土著青铜文化</b> .....	(56)
第一节 昭通地区土著青铜文化 .....	(57)
一、营盘墓地 .....	(57)
二、文家老包墓地 .....	(60)
三、白沙地墓地 .....	(60)
第二节 威宁中水土著青铜文化 .....	(60)
一、银子坛(梨园)墓地 .....	(62)
二、红营盘(独立树)墓地 .....	(66)
第三节 相关问题探讨 .....	(68)
一、文化类型及其特征和年代 .....	(68)
二、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	(70)
三、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及族属 .....	(70)
<b>第四章 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地区的土著青铜文化</b> .....	(73)
第一节 主要遗存及其研究 .....	(73)
一、晋宁石寨山墓地 .....	(73)

二、江川李家山墓地 .....	(86)
三、昆明羊甫头墓地 .....	(99)
四、呈贡天子庙墓地 .....	(111)
五、呈贡石碑村墓地 .....	(118)
六、呈贡小松山墓地 .....	(123)
七、安宁太极山墓地 .....	(124)
八、昆明五台山墓地 .....	(127)
九、昆明大团山墓地 .....	(130)
十、澄江金莲山墓地 .....	(132)
十一、江川团山墓地 .....	(136)
十二、滇池地区其他青铜文化遗存 .....	(138)
第二节 相关问题探讨 .....	(141)
一、族属与年代 .....	(141)
二、文化特征 .....	(143)
三、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 .....	(145)
四、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	(150)
<b>第五章 战国秦汉时期滇东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 .....</b>	<b>(159)</b>
第一节 主要遗存及其研究 .....	(159)
一、曲靖八塔台墓地 .....	(159)
二、曲靖横大路墓地 .....	(170)
三、曲靖平坡墓地 .....	(175)
四、嵩明凤凰窝墓地 .....	(178)
五、东川普车河墓地 .....	(182)
六、宣威朱屯村铜器 .....	(184)
七、泸西石洞村墓地 .....	(185)
八、泸西大逸圃墓地 .....	(188)
九、弥勒过洞村墓地 .....	(193)
第二节 相关问题探讨 .....	(195)
一、文化类型及其特征 .....	(195)
二、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 .....	(198)
三、族属及族群关系 .....	(199)
<b>第六章 战国秦汉时期滇西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 .....</b>	<b>(201)</b>
第一节 主要遗存及其研究 .....	(202)
一、楚雄万家坝墓地 .....	(202)
二、楚雄张家屯墓地 .....	(210)
三、牟定琅井铜器 .....	(212)
四、禄丰新村铜器 .....	(214)

---

五、祥云大波那木椁墓 .....	(215)
六、祥云检村石棺墓地 .....	(224)
七、祥云红土坡石棺墓地 .....	(229)
八、宾川古底石棺墓地 .....	(233)
九、宾川境内其他石棺墓 .....	(234)
十、宾川夕照寺村土圹墓 .....	(236)
十一、姚安营盘山土圹墓 .....	(239)
十二、大理洱海沿岸铜器 .....	(240)
十三、鹤庆黄坪墓地 .....	(243)
十四、弥渡直力石棺墓 .....	(245)
十五、弥渡合家山铜器和铸范 .....	(249)
十六、巍山母古鲁村铜器 .....	(251)
第二节 相关问题探讨 .....	(253)
一、文化遗存的年代 .....	(253)
二、文化类型及族属 .....	(254)
三、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	(257)
<b>第七章 战国秦汉时期滇西横断山区的土著青铜文化 .....</b>	<b>(261)</b>
第一节 主要遗存及其研究 .....	(261)
一、剑川鳌凤山墓地 .....	(261)
二、昌宁坟岭岗墓地 .....	(270)
三、昌宁境内零星出土铜器 .....	(275)
四、云龙坡头村铜器 .....	(279)
五、永平仁德村铜器 .....	(281)
第二节 相关问题探讨 .....	(282)
一、文化遗存的年代 .....	(282)
二、文化类型及族属 .....	(283)
三、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	(284)
<b>第八章 战国秦汉时期滇东南地区的土著青铜文化 .....</b>	<b>(285)</b>
第一节 主要遗存及其研究 .....	(285)
一、元江打篙陡墓地 .....	(285)
二、个旧石榴坝墓地 .....	(291)
三、蒙自鸣鹭墓地 .....	(294)
四、广南白崖脚墓地 .....	(295)
五、滇东南各地零星出土铜器 .....	(297)
第二节 相关问题探讨 .....	(308)
一、文化特征 .....	(308)
二、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	(309)

三、年代与族属 .....	(309)
<b>第九章 云贵高原的早期汉文化遗存 .....</b>	<b>(310)</b>
第一节 早期汉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	(310)
一、聚落遗址 .....	(311)
二、墓葬 .....	(312)
第二节 早期汉文化与土著青铜文化的关系 .....	(327)
<b>第十章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与社会文化变迁 .....</b>	<b>(330)</b>
第一节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	(330)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的渊源及兴起 .....	(336)
第三节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与域外的联系 .....	(341)
第四节 汉王朝对云贵高原的经略 .....	(346)
第五节 西汉中期以后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变迁 .....	(352)
一、土著族群的社会文化变迁 .....	(352)
二、早期汉人社会及其社会文化发展 .....	(363)
<b>第十一章 余论 .....</b>	<b>(368)</b>
一、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问题 .....	(368)
二、文化遗物反映的文化联系问题 .....	(372)
三、土著青铜文化的断代问题 .....	(374)
<b>附表 .....</b>	<b>(377)</b>
附表1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墓葬一览表 .....	(377)
附表2 云贵高原汉式土坟墓一览表 .....	(382)
<b>参考文献 .....</b>	<b>(383)</b>
<b>后记 .....</b>	<b>(402)</b>
<b>ABSTRACT .....</b>	<b>(405)</b>

## 插图目录

图 1-1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分区示意图	(24)
图 2-1	赫章辅处墓地和可乐墓地位置示意图	(31)
图 2-2	赫章可乐土著墓地分布示意图	(33)
图 2-3	赫章可乐 M273 平面、剖视图	(34)
图 2-4	赫章可乐 M277 平面、剖视图	(34)
图 2-5	可乐文化墓地出土铜容器	(36)
图 2-6	可乐文化墓地出土铜器	(37)
图 2-7	可乐文化墓地出土铁器和铜铁合制器	(38)
图 2-8	可乐文化墓地出土器物	(39)
图 2-9	正安出土铜虎钮鐎于	(48)
图 2-10	普安铜鼓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49)
图 2-11	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器物	(51)
图 2-12	黔西南各地零星出土铜器	(55)
图 3-1	战国秦汉时期昭鲁盆地主要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	(56)
图 3-2	昭通营盘墓地甲区和文家老包墓地出土铜器与陶器	(58)
图 3-3	昭通营盘墓地乙区出土器物	(59)
图 3-4	威宁中水土著墓地分布示意图	(61)
图 3-5	威宁中水 79 梨 M43 平面图	(62)
图 3-6	威宁中水银子坛(梨园)墓地出土铜器	(64)
图 3-7	威宁中水银子坛(梨园)墓地出土陶器	(65)
图 3-8	威宁中水银子坛(梨园)墓地出土铁器和石器	(66)
图 3-9	威宁中水红营盘(独立树)墓地出土器物	(67)
图 4-1	滇池地区滇文化主要遗存分布示意图	(74)
图 4-2	晋宁石寨山 M6 平面图	(76)
图 4-3	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铜兵器	(78)
图 4-4	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铜器	(80)
图 4-5	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铜器和铁器	(81)
图 4-6	江川李家山墓地发掘墓葬分布示意图	(87)
图 4-7	江川李家山 M51 椁室平面图	(89)
图 4-8	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铜兵器	(90)
图 4-9	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铜器	(93)
图 4-10	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器物	(95)

图 4-11	昆明羊甫头 M102 平面、剖视图	(100)
图 4-12	昆明羊甫头 M113 椁室结构剖视图	(100)
图 4-13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铜兵器	(102)
图 4-14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铜器	(104)
图 4-15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器物	(106)
图 4-16	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陶器	(108)
图 4-17	昆明羊甫头 M113 出土漆木器	(109)
图 4-18	呈贡天子庙 M41 墓圪及木椁结构示意图	(113)
图 4-19	呈贡天子庙墓地出土铜器和铁器	(115)
图 4-20	呈贡天子庙墓地出土陶器	(117)
图 4-21	呈贡石碑村墓地第一次发掘墓葬分布示意图	(119)
图 4-22	呈贡石碑村墓地出土铜器和铁器	(120)
图 4-23	呈贡石碑村墓地出土陶器	(121)
图 4-24	呈贡小松山墓地出土陶器	(123)
图 4-25	安宁太极山 M1 平面图	(125)
图 4-26	安宁太极山墓地出土铜器和陶器	(126)
图 4-27	昆明五台山 M3 平面图	(127)
图 4-28	昆明五台山墓地出土铜器	(128)
图 4-29	昆明五台山墓地出土陶器	(129)
图 4-30	昆明大团山墓地出土铜器和陶器	(131)
图 4-31	澄江金莲山 M74 平、剖面图	(133)
图 4-32	澄江金莲山墓地出土器物	(135)
图 4-33	江川团山 M4 平面图	(137)
图 4-34	江川团山墓地出土铜器	(137)
图 4-35	玉溪刺桐关遗址出土陶器和石器	(139)
图 4-36	晋宁小平山遗址出土陶器	(140)
图 4-37	晋宁石寨山 M12 出土“杀人祭铜柱场面”铜贮贝器 (M12:26)	(146)
图 4-38	晋宁石寨山 M12 出土铜贮贝器上的人物活动场景纹饰 (拓本)	(148)
图 4-39	滇池地区滇文化墓葬出土汉式器物	(155)
图 4-40	镶嵌绿松石的铜扣饰与铜牌饰	(156)
图 5-1	战国秦汉时期滇东高原主要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	(160)
图 5-2	曲靖八塔台墓地平面图	(161)
图 5-3	曲靖八塔台墓地二号堆 M69 平面图	(162)
图 5-4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铜兵器	(163)
图 5-5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铜器	(165)
图 5-6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器物	(166)
图 5-7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陶器	(167)

图 5-8	曲靖横大路墓地平面图 .....	(171)
图 5-9	曲靖横大路 M96 平面图 .....	(171)
图 5-10	曲靖横大路墓地出土铜器 .....	(172)
图 5-11	曲靖横大路墓地出土陶器和木器 .....	(173)
图 5-12	曲靖平坡墓地出土器物 .....	(177)
图 5-13	嵩明凤凰窝墓地 1986 年出土铜器和石器 .....	(181)
图 5-14	东川普车河墓地出土铜器和铁器 .....	(183)
图 5-15	宣威朱屯村出土铜器和石器 .....	(185)
图 5-16	泸西石洞村 M55 平面、剖视图 .....	(186)
图 5-17	泸西石洞村墓地出土器物 .....	(187)
图 5-18	泸西大逸圃墓地出土兵器 .....	(190)
图 5-19	泸西大逸圃墓地出土器物 .....	(191)
图 5-20	弥勒过洞村墓地出土铜器 .....	(194)
图 5-21	八塔台文化与滇文化出土器物对比图 .....	(197)
图 6-1	战国秦汉时期滇西高原主要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 .....	(201)
图 6-2	楚雄万家坝 M23 平面、剖视图 .....	(203)
图 6-3	楚雄万家坝墓地出土铜器 .....	(204)
图 6-4	楚雄万家坝墓地出土器物 .....	(205)
图 6-5	楚雄张家屯墓地出土铜器 .....	(211)
图 6-6	牟定琅井出土铜器 .....	(213)
图 6-7	禄丰新村出土铜器和铅器 .....	(215)
图 6-8	祥云大波那 M1 木椁剖视图 .....	(216)
图 6-9	祥云大波那 M1 铜棺 .....	(217)
图 6-10	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出土铜器和锡器 .....	(218)
图 6-11	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出土铜器 .....	(219)
图 6-12	祥云大波那 M1 出土动物铜模型 .....	(220)
图 6-13	祥云检村 M1 平面、剖视图 .....	(225)
图 6-14	祥云检村石棺墓地出土铜器 .....	(226)
图 6-15	祥云红土坡 M14 出土铜器 .....	(231)
图 6-16	祥云红土坡 M14 出土铜杖首 .....	(232)
图 6-17	宾川古底石棺墓地出土铜器 .....	(234)
图 6-18	宾川境内石棺墓出土铜器 .....	(235)
图 6-19	宾川夕照寺村土圹墓出土铜器 .....	(238)
图 6-20	大理洱海沿岸出土铜器和铜铁合制器 .....	(241)
图 6-21	鹤庆黄坪土圹墓出土铜器和陶器 .....	(244)
图 6-22	弥渡苴力石洞山 M7 平面、剖视图 .....	(246)
图 6-23	弥渡苴力石棺墓出土铜器和陶器 .....	(247)

图 6-24	弥渡合家山遗址出土铸范 .....	(250)
图 6-25	弥渡合家山遗址出土铜器 .....	(251)
图 6-26	巍山母古鲁村窖藏出土铜器 .....	(252)
图 6-27	雅砻江下游地区出土铜器 .....	(258)
图 7-1	战国秦汉时期滇西横断山区主要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 .....	(262)
图 7-2	剑川鳌凤山 M50 平面图 .....	(263)
图 7-3	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铜兵器和铜工具 .....	(264)
图 7-4	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铜器 .....	(265)
图 7-5	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陶器和玉石器 .....	(266)
图 7-6	昌宁坟岭岗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 .....	(270)
图 7-7	昌宁坟岭岗 M35 平、剖面图 .....	(271)
图 7-8	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器物 .....	(272)
图 7-9	昌宁坟岭岗 M20 出土铜铃和铜饰串连示意图 .....	(274)
图 7-10	昌宁境内出土铜器 .....	(276)
图 7-11	云龙坡头村出土铜斧(钺) .....	(280)
图 7-12	永平仁德村出土铜器 .....	(282)
图 8-1	战国秦汉时期滇东南地区主要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 .....	(285)
图 8-2	元江打篙陡 M67 平面、剖视图 .....	(286)
图 8-3	元江打篙陡墓地出土铜器 .....	(288)
图 8-4	元江打篙陡墓地出土铜器和陶器 .....	(289)
图 8-5	个旧石榴坝墓地出土器物 .....	(292)
图 8-6	蒙自鸣鹭墓地出土铜器和陶器 .....	(294)
图 8-7	广南白崖脚 M1 出土铜器和铁器 .....	(296)
图 8-8	滇东南地区零星出土铜器和铜铁合制器 .....	(298)
图 8-9	滇东南地区零星出土铜器(一) .....	(301)
图 8-10	滇东南地区零星出土铜器(二) .....	(302)
图 8-11	滇东南地区零星出土铜器(三) .....	(304)
图 9-1	赫章可乐粮管所遗址出土文字瓦当(拓本) .....	(311)
图 9-2	云贵高原发现的汉式土圹墓分布示意图 .....	(313)
图 9-3	云贵高原 A 型汉式土圹墓平面、剖视图 .....	(317)
图 9-4	云贵高原 B 型汉式土圹墓平、剖面图 .....	(318)
图 9-5	云贵高原 C 型汉式土圹墓平、剖面图(赫章可乐 M8) .....	(319)
图 9-6	云贵高原汉式土圹墓出土陶器 .....	(322)
图 9-7	云贵高原汉式土圹墓出土铜器 .....	(323)
图 9-8	云贵高原汉式土圹墓出土铁器和金银器 .....	(324)
图 9-9	云贵高原汉式土圹墓出土器物 .....	(325)
图 9-10	赫章可乐汉式土圹墓与土著墓分布示意图 .....	(328)

---

图 10-1	云贵高原青铜时代遗址出土铜器及石铸范 .....	(338)
图 10-2	滇文化墓葬出土域外文化风格器物 .....	(345)
图 10-3	两汉时期云贵高原汉式墓分布扩展示意图 .....	(349)
图 10-4	柬埔寨波萝勉省波赫墓地发现的套头葬和覆面葬 .....	(356)
图 10-5	越南北部出土铜器和铜铁合制器 .....	(358)
图 10-6	可乐文化人群南迁示意图 .....	(359)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课题的设置

云贵高原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里自然生态环境独特，族群众多，长期以来文化的地域色彩也较浓厚。因地处边陲，云贵高原的古代历史是中国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和研究表明，该地区古代历史的发展既与内地的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又有其特殊的一面。云贵高原还是沟通亚洲腹地和中南半岛以及连接中国内地和印度等地的枢纽，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很多资料显示，这一地区自古就是族群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基于这些原因，有关云贵高原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历来颇受关注。

战国秦汉时期，是云贵高原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在此期间，云贵高原从史前或原史时期过渡到历史时期，由之前的“徼外蛮夷”之地演变为中央王朝的地方政区。同时，当地“西南夷”土著族群创造的青铜文化在进入鼎盛阶段后，继而又走向衰落，并逐步为铁器文明所取代。因此，在云贵高原的区域史研究当中，战国秦汉时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战国后期秦举巴蜀后，云贵高原渐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所关注，后来成为秦汉帝国拓疆和统一活动的重要方向，并最终被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版图。从这一意义上讲，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对认识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理解汉文化的扩张与传播，学术价值亦不言而喻。

对于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历史和文化，《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及《后汉书》等早期文献都有过一些记载，从而为后人勾画了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基本轮廓与框架。但由于这些记载内容有限，且书写者的立场和视角难免带有一定局限性，因而要全面、深入认识这段历史尤其是当地西南夷族群的历史和文化，还将有赖于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贵高原地区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资料，同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都为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以往有关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研究中，仍存在不少空白或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而且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以及学术本身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新的问题也渐次产生。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当前有条件也有必要对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作一全面梳理，并将之作为一个专题展开综合性的研究。

## 第二节 研究史的回顾

### 一、主要考古发现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而展开的。在此之前，传统金石学和一些地方志中收录过一些出自云贵高原的古器物，但其中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很少。20世纪20~40年代，卫聚贤、贾兰坡、吴金鼎、曾昭燏、万斯年等学者以及一些外国考察队曾在云南一带开展过考古调查工作，有的还进行了发掘<sup>①</sup>，但有关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亦基本不见。进入50年代以后，云贵高原的考古工作发展较快，调查并发掘了大批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占有相当比重。从发现看，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主要分布于高原上较为低洼的盆地（坝子）以及河流、湖泊附近，以墓葬为主，另有为数不多的聚落遗址和窖藏等。

在云南高原，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发掘了大量的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其中以滇池和抚仙湖周边的“滇中断陷湖区”（泛称“滇池地区”）较为集中。最为有名的如晋宁石寨山墓地和江川李家山墓地，此外，昆明羊甫头、安宁太极山、呈贡天子庙和石碑村等墓地也都比较重要。这些墓葬因其浓郁的地方风格，尤其是随葬大量精美而富有特色的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其中石寨山M6出土了1枚刻有“滇王之印”的金印，表明这是一座汉代滇王之墓。滇池地区还发现并发掘一些与上述墓葬年代相近的聚落遗存，较重要的如玉溪刺桐关遗址和晋宁小平山遗址。滇东高原和滇东北地区也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坝子，这些坝子及其附近往往分布有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已进行发掘并发表报告的主要有曲靖八塔台、横大路和平坡墓地，东川普车河墓地，嵩明凤凰窝墓地，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昭通营盘墓地等。这些墓地以土著墓葬为主，文化面貌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墓葬多较为接近，但也有的差别较大。在滇西高原，即龙川江上游至洱海周围这一区域，也发现相当数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遗存，仍以墓葬为主，经发掘且较重要的有楚雄万家坝墓地，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检村石棺墓地、红土坡石棺墓地，宾川古底石棺墓地、夕照寺村土圹墓，鹤庆黄坪墓地，弥渡直力石棺墓等。此外，该地区还发现可能与铸铜有关的作坊遗址以及铜器窖藏等遗存。滇西高原发现的这些青铜文化遗存总体面貌趋于一致，特别是青铜器的风格、特征多较相近，但在文化内涵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滇西高原以西的横断山区，已超出地理学意义上的云贵高原，但这里发现的土著青铜文化遗存与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较大规模的发掘主要有剑川鳌凤山墓地和昌宁坟岭岗墓地，其他多是零星出土的铜器。滇东南地区也发现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遗存，但资料较为零散。正式发掘的墓葬主要有元江打篙陡、个旧石榴坝和蒙自鸣鹭等墓地，采集或征集的铜器较多。从发现看，滇东南地区的

<sup>①</sup> 参见戴宗品《云南金石学及早期考古活动述略》，《云南文物》2000年第2期。

土著青铜文化有一定的地方特色。除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外，云南也发现一些汉文化遗存，但只发掘过少量墓葬，其中在年代上与土著青铜文化有过并存关系的主要是一些汉式土圜墓。据目前材料，这些汉式土圜墓多分布于滇池地区及其附近的嵩明等地，滇东北的昭通以及滇东南的个旧、广南也有发现。

在贵州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工作长期以来一直相对薄弱，但随着考古发现的逐渐增多，局面正在改观。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黔西地区，尤以黔西北赫章可乐墓地和威宁中水墓地较为重要。黔西南地区除零星出土的一些铜器外，在普安铜鼓山发掘了一处战国秦汉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黔西地区发现的这些土著青铜文化遗存与滇池地区的滇文化以及滇东高原一带的土著青铜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地方特色亦很突出。其中赫章可乐发现的“套头葬”等奇特葬俗，比较引人关注。贵州东部地区也发现一些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但资料零散，面貌不甚清楚。贵州发现的汉文化遗存相对较多，仍以墓葬为主，另有少量聚落遗存。与土著青铜文化在年代上有并存关系的汉式墓基本都为土圜墓。这些汉式土圜墓在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于黔东北的务川等地，西汉中期以后在黔西地区逐渐增多，威宁、赫章、安顺、平坝、清镇、黔西、兴仁等地均有发现。有些地方如赫章可乐的汉式土圜墓和土著青铜文化墓葬同处一个地理单元，双方“和谐”并存。同时期的聚落遗存发现不多，进行过发掘的主要有赫章可乐粮管所遗址。

总体来说，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的调查与发掘收获颇丰，特别是一些重要墓地都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但田野工作的不平衡性问题也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区域开展的考古工作参差不齐，有的地区甚至未开展工作；二是比较偏重墓葬，对聚落等其他遗存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明显滞后；三是土著遗存发掘较多，而对汉文化遗存重视不够。

## 二、主要研究

伴随着田野工作的开展，对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研究大致有两部分：一是发掘报告所作的个案性研究，因主要围绕报告内容展开，故多是一些初步性的推论；二是学者们所作的各类综合研究。总的来说，除一些器物个案研究有时会涉及云、贵两个地区外，将云贵高原作为整体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比较少见，因此这里主要按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两个区域分别进行概述。

### （一）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概况

#### 1. 土著青铜文化的研究

有关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土著青铜文化的研究开展较多，内容主要包括遗存年代、族属、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青铜冶铸工艺与技术、与其他文化的联系等。此外，还有关于文化分区及类型划分的讨论、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类型文化所作的综合研究、对云南铁

器和铁器冶铸业起源问题的探索以及很多出土遗物的个案研究等。各种综合研究以论文形式为主，数量上百篇，另有少量专著。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土著青铜文化的年代问题，论者较多。1959年出版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对石寨山墓地第二次发掘的20座墓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编年研究，认为墓葬年代主要在西汉初到东汉初之间，早晚有一定的变化<sup>①</sup>，该编年后来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1975年发表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对李家山第一次发掘清理的27座墓葬进行了编年研究，认为墓葬年代大致在战国末至东汉初之间，以西汉中期汉武帝在云南置益州郡为界，大致分为早、晚两期<sup>②</sup>。由于石寨山墓地和李家山墓地是滇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因此它们的编年对滇文化及相关青铜文化的断代研究起到了标尺性作用。不过，1977年李家山M21两个碳-14测年数据发表后<sup>③</sup>，有学者据此推定李家山部分早期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时期，上限约当春秋晚期<sup>④</sup>。这一意见对后来滇文化及云南其他一些青铜文化的断代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滇西高原，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和楚雄万家坝墓地是两处比较重要的土著青铜文化遗存。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年代依1964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大约相当于石寨山第二次发掘的Ⅲ、Ⅳ类墓，即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sup>⑤</sup>。但该墓两个碳-14测年数据发表后<sup>⑥</sup>，不少学者将墓葬年代向前提至战国早中期。关于万家坝墓地的年代，1983年刊布的发掘报告主要根据碳-14测年数据，推断大致在西周至战国时期<sup>⑦</sup>。在此后滇西高原等地土著青铜文化的研究中，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和万家坝墓地常被作为断代的标尺。由于编年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先后有学者就云南高原青铜文化的年代问题展开专门探讨。首先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皮拉左里著文讨论滇文化的年代问题，其通过对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庙、石碑村等滇文化墓地出土铜器的研究，得出这些遗存的年代介于公元前250年至公元50年之间的结论，同时指出不同遗存间差异的形成，除了和年代早晚有关外，还应考虑其背后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族群关系等因素<sup>⑧</sup>。其后，徐学书对有关的碳-14测年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断代上的局限性，进而通过与四川等地考古遗存的比较，对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的年代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认为滇文化与滇西青铜文化是同时产生和并存的两种青铜文化，其兴起于西汉早期，至西

①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②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③ 两个数据分别为距今（1950年）2575年±105年和2500年±105年（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④ 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⑤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12期。

⑥ 两个数据分别为距今（1950年）2415年±75年和2350年±75年（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⑦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⑧ 米歇尔·皮拉左里著，吴臻臻译，莫润先校：《滇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汉晚期衰落<sup>①</sup>。尽管这些研究不乏说服力,但并没能引起太多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新发表的发掘报告如《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sup>②</sup>、《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sup>③</sup>等在墓葬断代上仍然趋早,相关研究亦多是如此<sup>④</sup>。可见,在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问题上,学术界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年代的上限上。

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分区与类型问题,很早就有学者予以关注,如20世纪70年代童恩正在研究西南地区的剑、戈等青铜兵器时,就按滇池和洱海两个地区对云南出土的此类器物进行研究<sup>⑤</sup>。其后,他在一篇有关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中,又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滇池、洱海、滇西北等不同区域分别展开论述<sup>⑥</sup>。80年代末以后,随着考古材料的进一步积累,学者们在这方面的讨论渐多,有的是专门就此进行的研究。王大道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两大区域共五个类型,第一个区域为洱海、墨江——李仙江以东、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分滇池区域、洱海区域、红河流域三个类型;第二个区域为洱海、墨江——李仙江以西地区,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和澜沧江中、下游两个类型<sup>⑦</sup>。张增祺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四个区域类型,分别为滇池区域、滇西地区、滇西北和滇南地区类型<sup>⑧</sup>。罗二虎将云南高原上的青铜文化大致分为滇池和洱海两个类型,滇池类型又称滇文化,洱海类型基本上可视为滇文化的另一种地区类型<sup>⑨</sup>。杨帆将云南及周邻相关青铜文化划分为滇西北及川西南区、川滇黔交界区、滇池及滇东南区三个大区,有的区又进一步分出不同的类型<sup>⑩</sup>。范勇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洱海周围区域、沿滇池区域、滇西边地区、滇南红河区域等四个区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洱海、滇池、滇边、红河四类型说<sup>⑪</sup>。彭长林根据文化特征的差异将云南高原的青铜文化分为滇池区、滇南和滇东南区、滇西区、滇西北区、滇东北区等几个区

① 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

②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④ 范勇:《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

⑤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⑥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⑦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五个类型及其与班清、东山文化的关系》,《云南文物》第24期,1988年;《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第6期。

⑧ 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的类型与族属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云南青铜文化研究》,《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⑨ 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16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

⑩ 杨帆:《试论云南及周边相关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云南文物》2002年第1期。

⑪ 范勇:《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

域<sup>①</sup>。可以看出,在云南青铜文化总体框架以及一些主要文化类型的认识上,大家的看法比较趋近,但不同学者所作的文化分区和类型划分又存在一定的差别。这既和不同阶段的考古资料积累程度有关,也反映出人们对具体考古遗存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类型土著青铜文化开展的专门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滇池地区和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因资料相对丰富,相关研究开展较早。20世纪80年代,汪宁生<sup>②</sup>、王大道<sup>③</sup>、张增祺<sup>④</sup>分别就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研究,探讨了该区域青铜文化的特征内涵、年代分期、遗存反映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性质、与汉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90年代后期,还出现一些对滇池地区青铜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sup>⑤</sup>。80年代至90年代初,张增祺<sup>⑥</sup>、宋治民<sup>⑦</sup>、阚勇<sup>⑧</sup>等先后对滇西青铜文化开展专门研究,探讨的内容除文化的年代分期、特征内涵及其反映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外,还涉及文化渊源、族属等问题。元江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资料虽不多,但也有学者做过初步性的探讨<sup>⑨</sup>。近年来,随着滇东北昭鲁盆地考古发现的增多,先后有学者对该地区及其附近的土著青铜文化进行梳理,并讨论相关文化的类型、渊源及族属等问题<sup>⑩</sup>。此外,还有学者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来研究相关遗存,除“滇文化”外,主要是“石寨山文化”的提出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汪宁生首次提出石寨山文化的概念,但从其论述看,该文化年代上起商代,下至西汉,延续千年以上,分布范围遍及云贵高原的大部<sup>⑪</sup>。可能是因为时空范围涵盖太广,不利于研究的深入等缘故,学术界对此反响不大。90年代后期,蒋志龙对石寨山文化进行了再研究,将该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压缩在滇中和滇东高原一带,主要遗存与滇文化大体相当,但在年代上,其上限可达春秋早期或更早,向下延续至东汉初,前后亦近千年<sup>⑫</sup>。其后,他又提出了石寨山文

① 彭长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第20页,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② 汪宁生:《云南考古》第41~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 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④ 张增祺:《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内涵分析》,《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⑤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晋宁石寨山》,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⑥ 张增祺:《滇西青铜文化初探》,《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⑦ 宋治民:《云南西部地区一些青铜文化墓葬的初步讨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⑧ 阚勇:《滇西青铜文化浅谈》,《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⑨ 师培砚、尹天钰:《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云南文物》第18期,1985年。

⑩ A. 丁长芬:《昭通青铜文化初论》,《云南文物》2002年第1期。

B. 孙华:《滇东黔西青铜文化初论——以云南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的考古材料为中心》,《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⑪ 汪宁生:《试论石寨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⑫ 蒋志龙:《再论石寨山文化》,《文物》1998年第6期。

化两类型说，两个类型分别指石寨山类型和八塔台类型<sup>①</sup>。关于八塔台类型，也有学者称之为“滇文化八塔台—横大路类型”<sup>②</sup>。以上这些按区域或类型开展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土著青铜文化的认识。当然，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步积累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高原的土著族群属于“西南夷”的范畴。由于《史记》等文献对这些族群有过一些记载，因此对相关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进行探讨，自然顺理成章。除发掘报告和发掘简报对此多有涉及外，还有一些专门或相关的研究。一般情况下，此类研究主要是根据地望和遗存的文化特征及内涵，再结合文献记载，来确定与古代族群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不少综合研究是在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如童恩正认为滇池和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分别是滇、“靡莫之属”的文化，他们同属古代濮族系统，滇西北地区的石棺葬文化是从甘青南下的氐羌系统民族的文化<sup>③</sup>。王大道认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是滇人的遗存，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主人是靡莫之属中的一支——靡非，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似为鉤町国的文化遗存，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的主体民族可能是僇、昆明人，澜沧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则是滇越的遗存<sup>④</sup>。张增祺认为滇池区域青铜器的主人是“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滇西地区青铜文化主要是昆明人创造的，滇西北的石棺葬是北方南迁的游牧民族“白狼”人的遗存，滇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也是百越民族创造的<sup>⑤</sup>。彭长林主要按族系探讨了各区青铜文化的族属，滇池区为百越、百濮和氐羌三支族群重组后形成的复合型民族，滇南和滇东南区为百越和百濮两支，但以百越为主，滇西区主要为百濮和氐羌中的僇、昆明，滇西北区为僇、昆明，滇东北区主要为氐羌的一支——僇人<sup>⑥</sup>。杨帆所划分的滇西北及川西南、川滇黔交界、滇池及滇东南三个大区分别对应氐羌、百濮和百越三支族群，在三大区之间的洱海至楚雄地区则居住着僇、昆明人，他们在文化上受到前面三大族群的共同影响<sup>⑦</sup>。范勇认为洱海周围区域的青铜文化为靡莫之属的遗存，但这些靡莫之属不宜与滇直接等同，沿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可与滇人相联系，滇西边地区域的青铜文化可能与僇、昆明有关，滇南

① 蒋志龙：《试论石寨山文化的两个类型——石寨山类型和八塔台类型》，《云南文物》2000年第2期。

② A.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187~18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B. 戴宗品：《论滇文化“八塔台—横大路类型”》，《云南文物》2003年第3期。

③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④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五个类型及其与班清、东山文化的关系》，《云南文物》第24期，1988年；《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第6期。

⑤ 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的类型与族属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云南青铜文化研究》，《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 彭长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第212~253页，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⑦ 杨帆：《试论云南及周边相关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云南文物》2002年第1期。

红河区域的青铜文化则与哀牢夷和鸠僚有关<sup>①</sup>。孙华通过对滇东、黔西青铜文化的研究,推测以曲靖八塔台墓地为代表的一类青铜文化是夜郎的遗存,昭鲁盆地一带的青铜文化可能与且兰、牂牁等古族有关,而洱海及其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可能是嵩、昆明的遗存<sup>②</sup>。个案研究方面,主要有关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和楚雄万家坝墓地族属问题的讨论,童恩正认为这两处遗存的族属都是与滇关系密切的靡莫之属<sup>③</sup>,但也有很多人主张它们是嵩、昆明人的遗存<sup>④</sup>。对滇文化主体人群族系的讨论也有很多。童恩正<sup>⑤</sup>、汪宁生<sup>⑥</sup>持濮人说,尤中提出夔人说,同时指出夔人原是氏羌一支<sup>⑦</sup>,张增祺认为属“百越”系统<sup>⑧</sup>,近来又有研究推测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中的某一支<sup>⑨</sup>,各种看法莫衷一是。除此之外,还有对出土人物图像进行族别研究的,如冯汉骥<sup>⑩</sup>、汪宁生<sup>⑪</sup>、张增祺<sup>⑫</sup>等人关于石寨山所出铜器上诸多人物形象的族属研究。至于发掘报告或发掘简报对遗存族属的推定,则情况复杂,往往涉及一些更具体的族群,如曲靖八塔台和横大路墓地推测和历史上与滇“同姓相扶”的劳漫、靡莫有关<sup>⑬</sup>,泸西石洞村和大逸圃墓地的族属可能为文献所记的“漏卧”部族,属氏羌系统<sup>⑭</sup>。不难看出,对云南土著青铜文化族属的研究实际存在具体族属、族系及族源等不同的层次,而由于大家在对古代文献的理解、族群概念和内涵的把握以及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尽管数量丰富,但分歧也比较突出。

① 范勇:《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

② 孙华:《滇东黔西青铜文化初论——以云南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的考古材料为中心》,《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③ 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考古》1966年第1期;《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④ A. 宋治民:《云南西部地区一些青铜文化墓葬的初步讨论》,《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B. 张增祺:《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文化》第256~25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⑤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⑥ 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⑦ 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17~2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⑧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160~17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第867~87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⑩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⑪ 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⑫ 张增祺:《关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一组人物形象的族属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⑬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18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⑭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共泸西县委、泸西县人民政府、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第109页,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高原土著族群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不少，主要集中在对滇人社会的研究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内学术界一直把滇视为奴隶制社会并加以研究，如林声<sup>①</sup>、王大道<sup>②</sup>、童恩正<sup>③</sup>等人对滇人社会的探讨。1994 年，童恩正将西方人类学的酋邦理论引入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中，以滇为例论述了古代西南地区的酋邦制度，提出滇是一个具有复杂酋邦特征的社会，并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sup>④</sup>。该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的视角上都颇具新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汉王朝征服云南以前的滇族社会是带有母权制残余的酋邦社会<sup>⑤</sup>。另外还有学者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来研究滇人的社会形态，认为西汉中期以前的滇族社会可称为“酋邦制”社会，也可称为“方国”，相当于苏秉琦提出的关于国家起源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之方国阶段<sup>⑥</sup>。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围绕滇人的社会结构等问题开展过一系列的研究，如 20 世纪 60 年代 Magdalene von Dewall 通过对晋宁石寨山和安宁太极山出土器物的分析，探讨了滇的社会结构，提出滇人实行联邦式的多族群统治。又如近年来，李润权、Alice Yao、佻宽司等人利用统计学和社会考古学的方法、理论来分析滇文化的墓葬材料，进而研究滇的社会组织结构，Rode Penny 和邱兹惠等人则采用这些方法来研究滇人的性别地位差异及其变化等问题<sup>⑦</sup>。总的来看，关于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高原土著族群社会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逐步细化的趋势。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除滇之外，对其他族群的研究还较薄弱。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显得相对单一，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有时缺乏对原始考古材料必要的辨识，如遗存断代往往照搬发掘报告，从而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还有一些学者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土著族群的生产经济、习俗信仰等问题。冯汉骥对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上的部分图像资料进行观察和阐释，研究滇人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及“祈年”、“孕育”、“报祭”、“诅盟”等各种习俗和仪式<sup>⑧</sup>。汪宁生也根据石寨山出土文物，对滇人的农牧渔猎、手工业、商贸、战争、信仰和祭祀、乐舞等社会经济生活

---

① 林声：《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图象所反映的西汉滇池地区的奴隶社会》，《文物》1975 年第 2 期。

② 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③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④ 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中华文化论坛》1994 年第 1 期。

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第 872 ~ 874 页，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⑥ 谢崇安：《从环滇池墓区看上古滇族的聚落形态及其社会性质——以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地为中心》，《四川文物》2009 年第 4 期。

⑦ 参见卢智基《近年国外滇文化研究新趋势》，《四川文物》2007 年第 4 期。

⑧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考古》1963 年第 6 期。

进行了讨论<sup>①</sup>。易学钟通过对铜贮贝器和铜房屋模型扣饰上的铸像以及铜鼓纹饰的观察、研究，探讨了滇人的信仰、建筑及礼仪制度等相关问题<sup>②</sup>。王大道就滇池地区青铜时代的金属农具展开专题研究，并讨论了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及特点<sup>③</sup>。王大道、朱宝田对石寨山等地出土的织机部件及其他各类纺织工具进行梳理，讨论了它们的定名、用途，还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及民族学材料，研究当时的生产过程和纺织原料问题<sup>④</sup>。张兴永从考古发现出发，对云南先秦时期的畜牧业进行了综合研究<sup>⑤</sup>。肖明华主要根据考古材料专门论述了滇人的农牧业<sup>⑥</sup>。杨德文从出土文物探讨了战国至汉代滇西地区的锄耕农业<sup>⑦</sup>。张增祺<sup>⑧</sup>、张瑛华<sup>⑨</sup>分别从考古材料出发，研究了滇池地区滇人的宗教习俗及其相关问题。还有学者对滇人用玉习俗及其观念等进行了讨论<sup>⑩</sup>。张全超最近通过对澄江金莲山墓地出土人骨稳定同位素的初步分析，讨论了当时人们的食物构成和生存环境等一些列问题，该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可视为古代滇人经济模式研究在途径、方法上的新探索<sup>⑪</sup>。

青铜器铸造业是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地区土著族群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见。在铜器铸造工艺和技术研究方面，现代自然科技手段的较多应用成为一个突出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化学教研室对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sup>⑫</sup>。80年代，何堂坤又发表了关于滇池地区几件青铜器合金成分、器表锡层的检测与分析报告<sup>⑬</sup>。进入新世纪以来，自然科技手段在滇文化铸铜工艺和技术研究中的运用愈加广泛，出现不少新的成果，大多是通过出土铜器的检测，从金属成分和金相学的角度来分析、讨论铜器的合金成分以及镀锡、鎏金等器表装饰工

① 汪宁生：《“滇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晋宁石寨山文物研究之一》，《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晋宁石寨山1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石寨山三件人物屋宇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铜鼓鼓面“四飞鸟”图象新解》，《考古》1987年第6期。

③ 王大道：《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金属农业生产工具》，《考古》1977年第2期。

④ 王大道、朱宝田：《云南青铜时代纺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⑤ 张兴永：《云南春秋战国时期的畜牧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⑥ 肖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农牧业》，《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

⑦ 杨德文：《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汉代滇西地区的锄耕农业》，《云南文物》第34期，1992年。

⑧ 张增祺：《滇王国时期的原始宗教和人祭问题》，《云南文物》第14期，1983年。

⑨ 张瑛华：《试论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反映的宗教习俗》，《云南文物》第20期，1986年。

⑩ 王丽明：《古滇玉器的功用初探》，《云南文物》2004年第1期。

⑪ 张全超：《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出土人骨稳定同位素的初步分析》，见《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附录，《考古》2011年第1期。

⑫ 杨根：《云南晋宁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⑬ 何堂坤：《滇池地区几件青铜器的科学分析》，《文物》1985年第4期。

艺和技术<sup>①</sup>。除滇文化铜器外，曲靖八塔台<sup>②</sup>、楚雄万家坝<sup>③</sup>、祥云大波那<sup>④</sup>、祥云红土坡<sup>⑤</sup>、个旧石榴坝<sup>⑥</sup>等地墓葬出土的铜器也都做过这方面的检测和分析。20世纪80年代，曹献民<sup>⑦</sup>、张增祺<sup>⑧</sup>还先后对云南出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及工艺开展综合研究，内容涉及铸范、合金配比以及具体的铸造流程和加工工序等。王大道则从现代石范铸造工艺的角度来探索云南古代青铜器铸造的有关问题<sup>⑨</sup>。90年代末，王大道又对云南各地出土的青铜时代的铸范进行了研究，并以之为基础讨论了当时的范铸技术及相关问题<sup>⑩</sup>。近来，邱兹惠专门对云南早期铜鼓的铸造技术及其渊源进行了探讨<sup>⑪</sup>。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青铜器尤其是滇文化铜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因此不少学者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当时的青铜器及青铜铸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亦相对较杂，这里择其要者作简单介绍。李昆生等专门讨论了云南古代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艺术<sup>⑫</sup>。李伟卿从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技巧以及情节气氛等角度对云南青铜器的铸造艺术展开综

① A. 李晓岑、韩汝玢、蒋志龙：《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文物》2004年第11期。

B. 崔剑锋、吴小红、李昆声、黄德荣、王海涛：《古滇国青铜器表面镀锡和鍍金银技术的分析》，《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

C. 李晓岑、韩汝玢、杨帆：《羊甫头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研究》，见《昆明羊甫头墓地》第996~100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D. 李晓岑、张新宁、韩汝玢、孙淑云：《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出土金属器的分析和研究》，《考古》2008年第8期。

E. 李晓岑、俞雅丽、韩汝玢、田建、王涵：《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铜铁器的科学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2期。

F. 李晓岑、韩汝玢：《古滇国金属技术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② 李晓岑、韩汝玢：《八塔台青铜时代墓葬出土金属器的分析鉴定》，见《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235~241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④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12期。

⑤ 李晓岑、俞雅丽、刘杰、李穆斌：《云南祥云红土坡古墓群出土金属器的初步分析》，《文物》2011年第1期。

⑥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铜刻刀分析鉴定报告》，《考古》1992年第2期。

⑦ 曹献民：《云南青铜器铸造技术》，《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⑧ 张增祺：《滇池地区青铜器铸造及合金工艺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⑨ 王大道：《曲靖珠街石范铸造的调查及云南青铜器铸造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11期。

⑩ 王大道：《云南出土青铜时代铸范及其铸造技术初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⑪ TzeHuey Chiou-Peng. The technical history of early Asian kettledrums. Bunker Emma C. and Latchford Douglas (eds.). Khmer bronze masterpieces.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2011: 17~25.

⑫ 李昆生、高钟炎：《云南古代青铜动物造型艺术》，《美术丛刊》1980年第12期。

合研究<sup>①</sup>。田晓雯根据扣饰这一典型器物的纹饰造型探讨了滇文化青铜器的装饰艺术<sup>②</sup>。樊海涛对滇文化铜贮贝器的装饰艺术进行了论述和研究<sup>③</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铅同位素的测量与分析开始被运用到云南青铜器的研究中来<sup>④</sup>。研究者们通过对铜鼓等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测试和分析,试图究明相关青铜工业的矿料来源,同时对铜鼓的起源、滇文化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滇文化与东山文化及汉文化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也展开了探讨。虽然铅同位素考古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局限性<sup>⑤</sup>,但这些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通过以上这些研究,使我们对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青铜冶铸业有了多方面的认识,不过,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这些信息来研究当地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外部文化的联系等各种相关问题,实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地探索。

关于和周邻及其他外部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是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高原土著青铜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除许多专题性的讨论外,其他相关研究中涉及此问题的比比皆是。研究表明,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与四川、两广、西北、北方草原、中原、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等地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化联系。关于和四川的联系,童恩正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西南地区的剑、戈等铜兵器时,就指出滇文化中的很多兵器与巴蜀文化之间存在渊源关系<sup>⑥</sup>,后来有很多研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sup>⑦</sup>。施劲松认为楚雄万家坝独木棺葬与巴蜀地区的船棺葬也有一定的联系<sup>⑧</sup>。另有很多学者关注云南青铜文化与川西高原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徐中舒曾提出,滇池地区的滇文化墓葬与滇王庄蹻及其臣属的后裔有关,而此庄蹻是川西茱萸一带岷山王国最后一个庄王,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后南迁至滇<sup>⑨</sup>。徐学书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指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是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的重要源头,后者的形成与西汉初年岷江上游石棺

① 李伟卿:《云南古代的铜铸艺术》,《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田晓雯:《从青铜扣饰看古滇国的装饰艺术》,《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樊海涛:《云南古代贮贝器艺术》,《长江文明》第六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 A. 李晓岑、李志超、张秉伦、彭子成、李昆声、万辅彬:《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考古》1992年第5期。

B. 崔剑锋、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以中国云南和越南出土青铜器为例》,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⑤ 彭子成、邓衍尧、刘长福:《铅同位素比值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考古》1985年第11期。

⑥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⑦ A. 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

B. 刘弘:《论蜀式戈的南传——西南地区青铜戈的再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⑧ 施劲松:《船棺葬、早期铜鼓和不对称形铜钺》,《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年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⑨ 徐中舒:《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蹻的关系》,《思想战线》1974年第4期。